

DOI 编码:10.3969/j. ISSN. 2095 - 4662. 2014. 01. 007

无法挣脱的尘网:陶渊明的休闲实践

程细权

(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摘要]彭泽辞官开启了陶渊明新的人生,他也因之被奉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人士。陶氏归隐田园的躬身实践,影响了许多中国士人的价值追求。陶渊明的人生选择,彰显了当下中国文化的某种缺失。透过历史的迷雾,仔细研读其作品,发现陶渊明彭泽辞官后并未真正做到了无牵挂。他质朴、率真、近乎自然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对权力、功名、生死的丝丝牵挂。基本物质保障的缺失、晋升通道的受阻、价值取向的游离,使陶渊明的休闲实践显得如桃花源般虚无缥缈。

[关键词]陶渊明;休闲实践;文化过滤

[中图分类号]G02/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4662(2014)01 - 0031 - 06

Failure in Escaping from Human World: Tao Yuanming's Leisure Practice

CHENG Xiquan

(Normal School,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3)

[Abstract] Resignation from Pengze turned a new page for Tao Yuanming and accordingly he was called a man who "never bows down to five dou of rice". His resigning and returning to the farmland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many people's value pursuit. His life choice revealed there was a lack of something in Chinese culture. After the careful reading of his work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he was still concerned about something after resignation. Though his daily life was plain, frank and so close to nature, he cared about the power, the fame, the life and death. The shortness of the basic material assurance, the frustration in the promotion of his official career and the hesitation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contribute to his illusory leisure practice.

[Key words]Tao Yuanming;leisure practice ;cultural filtration

“尘网”、“樊笼”是陶渊明对俗世的指称,为了摆脱这种羁绊,他毅然辞去了仅做了80多天的彭泽县令,重返“自然”,并从此彻底告别仕途。陶渊明的不合常人之举,为他赢得了流芳千古的美誉。傲视权贵,保持人格独立,过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是陶渊明留给许多人的印象。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大家对此赞赏有加。即使到今天,陶渊明依旧是观照当今现实

生活逃避不了的参照。他被称为是“生态文学家”的楷模,是“解救消费主义引发的整个人类文明的悲剧”的担当者^[1],是“自然休闲境界的典型代表”^[2]。他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出了休闲的最高境界,体悟到了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和谐统一^[3]。

众人之所以如此抬举陶渊明,个中的重要原因是,认为陶渊明彭泽辞官后挣脱了尘网的束

[收稿日期]2013-12-04

[作者简介]程细权(1973—),男,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及文学批译的研究。

缚,过的是诗意般的休闲生活。皮普尔在《休闲:文化的基础》(被誉为西方休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中指出,休闲是一种精神状态,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状态,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快乐^[4]。休闲就是“人的自在生命及其自由体验状态,自在、自由、自得是其最基本的特征”^[5],即“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由此观之,陶渊明彭泽辞官后果真过的是潇洒飘逸、怡然自得的休闲生活吗?细读《陶渊明集》,笔者认为,这里面恐怕还有不少人为的理想化成分。

一、辞官原因扑朔迷离

纵观陶渊明一生,彭泽辞官是一个重要节点。这个节点改变了陶渊明一生的人生走向,成就了陶渊明的人生功绩。从某种程度上看,彭泽辞官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件,是陶渊明留给中国文化的珍贵礼物。许多中国人都受其影响,比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高适无法容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现实,“转忆陶潜归去来”,他们的傲骨性格与陶渊明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陶渊明辞官的说法,历来众说纷纭,归结起来有这样几种:一是“不堪史职”,如《宋书》本传和《晋书》本传相关记载;二是忠于晋室,耻于屈身刘宋,如《南史》本传、萧统《陶渊明传》及葛立方《韵语阳秋》与陶澍《陶靖节先生集》相关记载;三是陶渊明有箕山之志,如颜延之、洪迈等人的观点;四是认为陶氏性情所致,如苏轼的观点;五是认为陶渊明有感于时局险恶,见微知著,及早退隐,如韩驹的观点^{[6]116-117}。此外,还有的人认为对陶渊明的归隐起决定作用的,是“两晋兴起的逍遥自足的思想意识和遁世隐逸的文化风尚”^[7]。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并有史实材料作为依据。不能忽视的是,陶渊明的辞官与其门第身份也有一定关联。东晋是一个最为典型的门阀政治社会。门阀氏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寒门子弟倍受压制。东晋门阀氏族主要有琅琊王氏、太原王氏、谯国恒氏、陈郡谢氏和颍川庾澄氏,前三者是旧有士族,后二者是魏晋新士族。陶渊明最引以为自豪的门第就是曾祖父陶侃,他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但由于陶侃出身于南方未入士大夫之流的边鄙豪族,被视为

武夫之辈。关于陶渊明与陶侃的关系,朱光潜提出了陶渊明“是否是陶侃的后人固有问题”的疑问,但肯定他是陶侃的“近房裔孙”^{[8]310}。近来有学者考证,证实陶渊明这支陶氏不是陶侃的正统,陶侃的长沙公爵位并没有被陶渊明的祖父陶茂继承,而由陶茂的兄弟陶范继承^{[6]119}。对此,陶渊明深有感慨,发出“昭穆既远,以为路人”(《赠长沙公族孙一首》诗序)的叹息。陶侃在东晋时被讥为“小人”、“溪狗”,更何况旁系的陶渊明。陶氏家族到陶渊明这辈家道更为衰落,他在社会政治地位上越发得不到重视,“最多只能算是寒素士人,而且与庶人阶层很接近”^[9]。陶渊明的家世出身和所处的时代环境,决定了他的政治抱负不可能有所作为,只能将“猛志逸四海”停留在心灵深处。这对陶渊明来说,的确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又不得不接受,“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

虽说历史的尘埃,很难拨开云雾见日月,陶渊明为何彭泽辞官后不再涉入仕途,恐怕只有当事人最为清楚。彭泽辞官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生抉择,陶渊明不可能不慎重。从他的人生经历看,在彭泽辞官之前,他有几次降志辱身与官场人物周旋的当官经历,但皆因“心为行役”、“志意多所耻”、“违己交病”而辞官。即使在彭泽辞官之后,他也有继续从政的机会:晚年刘裕征他做著作郎,他不就;江州刺史檀道济带着礼物劝他做官,他退回礼物主动放弃。显然,彭泽辞官是陶渊明经过深思熟虑、综合权衡后的结果。促使他下定决心的绝非单个原因,以上因素对陶渊明彭泽辞官都有影响,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陶渊明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所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只不过是借口而已。陶渊明辞官原因的复杂性,决定了他辞官后的心路历程和生活状态。“不堪史职”、忠于晋室、鉴于时局的险恶、门第身份,促使他不断反思自己,努力忘记功名利禄的诱惑;箕山之志、性情所致、玄学新风,导致他在自然生活中,触目成趣,物我相忘。

二、隐居后的生活

陶渊明隐居后的生活与他的思想密切相关。关于陶渊明的思想,学界颇多争议,“无

论是主张陶渊明儒释道三家思想哪一家最主要,都很难得到普遍认同”^[10],但可以肯定的是,陶渊明的思想中有儒家、佛家、道家的因素,它们共同构成陶渊明思想的复杂性。陶渊明辞官后的生活较为简单,农耕为主,闲时饮酒作诗,寄情自然之物。

(一)躬耕劳动:艰难

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崇尚自然,躬耕田园。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最符合自然之义。他在诗中写道:“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认为,人生归向有道,但首在衣食。本着这种认识,他归隐后一直以种田为生。这在其诗作中多有表现:“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杂诗》其八);“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他在农耕中守拙,寻找人生价值。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进步。当初,樊迟问学稼,被孔子视为小人;孟子对劳动似乎也较为鄙视,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两晋南北朝时,士族更是看不起劳动,颜之推《颜氏家训》说,“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务”。陶渊明冲破了狭隘的阶级意识,表明自己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然而,躬耕田园并非当初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那个年代,完全靠自耕是不能自养的,甚至有时温饱都成问题。刚归田园时,陶渊明有“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还有仆人,但不久之后,他就和普通农民一样陷入生活困境,正如他在诗中描绘到:“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其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杂诗》其八)“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劲气侵襟袖,簞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无一可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晚年的陶渊明生活更为贫困,若遇灾荒,日子更为艰难,有时不得不去乞食:“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怒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有会而作》)

(二)农闲时间:休闲

虽然农耕生活艰难,但陶渊明依然在其中体会到了生活的乐趣。“田园诗人”的称号就与之密切相关,他最被人称道的绝大多数诗歌都是写田园风光及劳动实践感悟,比如,《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饮酒》等,洋溢着扑面而来的闲情逸致,清新自然,很是惬意。诗中营造的饮酒、菊花、村舍、鸡犬、豆苗等意象,组成了一组组田园生活画卷,充满生态主义的健康情趣。

首先,他亲近自然,感受到了自然的旨趣。他居住的环境绿色生态:“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拟古》其一);“日没星与昂,势翳西山巅”(《杂诗》其一);“猛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读山海经》其一);“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腊日》)。他感受到的田野生活淳朴自然:“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其一);“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杂诗》其三)。他笔下的农耕生活生机盎然,自成天然:“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其一)“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拟古》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闲时流连自然,“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归园田居》其五)这里没有官场的虚伪、欺诈,没有车马的喧扰,有的只是自然的宁静,心境的自由恬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其次,他不避俗,享受到了人伦之乐。隐

士为了“达道”，一般归隐后尽可能避俗，和世俗保持一段距离。陶渊明本着人性应有的至性深情应世接物，不避俗，真正地“达道”。平常和陶渊明往来的人主要有三种：一是官场上的人物，如，刘牢之、王宏、刘敬宣、颜延之、庞参军、丁柴桑等；二是志趣相投的友人，如，莲社高僧慧远及居士弟子周继之、刘遗民；三是乡邻中的田夫野老。在这三种人中，田夫野老和陶渊明相知最深，“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移居》其二）“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他们对陶渊明也关爱有加，“壶浆远见候”（《饮酒》其九）。在享受天伦之乐方面，陶渊明既写了亲人间的温暖：“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悦亲戚之情话”（《归去来兮辞》）；也写了他们共享自然之乐：“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园田居》其四）；还写了他内心的愧疚，因弃官隐居使儿子们“幼而饥寒”，倍感“良独内愧”（《与子俨等疏》）。

其三，他生活安静，志趣高雅。读书、饮酒、赏花、著文，是陶渊明农闲生活的主要爱好。读书是他重要的闲暇消遣方式。“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言谈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饮酒是陶渊明隐居生活的另一个体现，“在诗集中写饮酒，以致形成一种文学的主题，应当说是自陶渊明始。酒，已成为陶渊明的生活和文学标志”^[11]。“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饮酒》十三）“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先生传》）“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答庞参军》）陶渊明心性高洁，他喜欢赏花，兰、松、竹、柳、菊等花木经常入诗，但他最爱的还是菊花。“余闲居，爱

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九日闲居》）有时他甚至拿菊花入酒，“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饮酒》其五）《宋书·隐逸传》记载了陶渊明菊丛中“即便就酌，醉而后归”的逸闻。龚自珍曾经这样写道，“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己亥杂诗》）著文是陶渊明面对田园生活陶冶性情的另一个重要表达，他在《饮酒》、《答庞参军》、《有会而作》等序文中对此作了交代，在《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等文中有记载，“常著文章自娱”。

三、并非真正休闲

农耕赋予了陶渊明大量的空闲时间，他充分利用并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其中有不少看似悠闲自在，但他辞官后的真实生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休闲。休闲的本质在于思想的纯洁与宁静，并轻松自如地淡然处事。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但他内心并非不关心世事，不管是功名还是生死他都念念不忘。

（一）功名之念从未忘记

田园与政治，在陶渊明的人生经历中交织在一起，他先后几次出来为官，最终躬身田园，劳作终其一生。作为一介穷困书生，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谋生，陶渊明的苦闷也就可想而知。他将壮志不能伸展的苦闷转移到田园，以自然作为旗帜，有时甚至用酒来麻醉自己，试图摆脱名利的束缚，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摆脱名教的束缚，立善求名对他还有诱惑的力量。崇尚自然和顺从名教两种思想常常在他心中交战，使他不能安宁”，“自然与名教的交战，集中表现为归隐与出仕的矛盾”^{[12]148}。

一方面，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虽然说“性本爱丘山”、“园林无世情”，但没有做到甘于寂寞。从小他身受儒家思想熏陶，有强烈的建功立业思想。“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即使退隐之后，内心也时常斗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其一）“华簪”常指代显贵的官职，陶渊明之所以说要忘记“华簪”，就是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忘怀。他热情歌颂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

余情。”(《咏荆轲》)他称赞精卫和刑天:“精卫衔微木,将以填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读山海经》其十)他关心收复中原,“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赠羊长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认为出仕为耻、隐士为高,“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与殷晋安别》)。他看到木槿花朝生暮落,就想到自己“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他写道:“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其四)他没有忘记名利,“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咏荆轲》)。

另一方面,他对隐居田园后生活颇感失落。官场生活的繁缛礼节、尔虞我诈,与他希望保持本真性情的愿望相距甚远。归隐前,他在田园与政治间的选择斗争就非常激烈,“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归隐后,虽然自我安慰,“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但由于田园生活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壮志未遂的苦闷不时流露,在《读山海经》、《止酒》等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他生活都成问题时,内心更是不得安宁。“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杂诗》其八)陶渊明希望进入庙堂,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来可以成就功名,二来可以改善家庭物质条件。对此,《归去来兮辞》序文有所交代,但他做官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成就功名。他想留名后世:“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拟古》其二)他不断思考名利问题,为此而纠结。“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杂诗》其四),“吁嗟身后名,於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朱熹眼光如炬,曾经在《朱子语类》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陶渊明“好名”,此语可谓一语中的。但由于门第身份限制,决定了陶渊明政治通途上的受阻,他退避田园撰写的《桃花源记》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

(二) 生死之虑分外强烈

生死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陶渊明也不例外。有人认为,陶渊明选择的是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死坦然^[13]。袁行霈也认为:“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而是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超越生死的眼光。”^{[12][20]}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陶渊明对死亡的深深恐惧”几乎无所不在^[14]。为何同样是一个人,学者得出如此截然不同的意见呢?这源于陶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思想中“有许多矛盾和冲突”^{[8][319]}。

一方面,他试图摆脱生死恐惧,超越生死,渴望“大化”。陶渊明主张“纵浪大化”,以“化”解脱人们惜生的痛苦。“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形影神》序)他认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无法抗拒,生前荣辱得失死后毫无意义。“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拟挽歌辞》其一)他对生死看得淡定:“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形赠神》)“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即使社会贤达也无法抗拒死亡威胁,死后同常人一样回归自然,“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其三)“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其七)

另一方面,他希望生命能够留下一点痕迹,忧虑生死。陶渊明一生贫穷,而且多病,“他的诗集满纸都是忧生之嗟”^{[8][319]}。他感叹光阴的流逝,“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十五)“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明且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岁暮和张常侍》)“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陶渊明对死亡的关切,主要是源于对功业无成的忧虑,“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其五)心

中的焦虑无法排解,借酒消愁,“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七)他固守隐逸身份,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保留功名的不得已选择。

(三) 误读原因:人为过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陶渊明彭泽辞官后,除了开始过了一段短暂的稍微舒适的生活外,其余大多数时间生活较为贫穷,还不时生病,饥饿是常态,有时甚至不得不外出乞食。基本生活条件的缺失,导致他内心时常处在焦灼的矛盾冲突痛苦之中。他没有摆脱俗世的牵绊,身心都不休闲。从休闲伦理来看,休闲应是社会维度、自然维度、个体维度的和谐统一。社会维度要求法纪约束,确保公平正义;自然维度要求敬重自然,心怀敬畏之心;个体维度强调自由自在,宁静致远。无论是陶渊明所处的时代环境,还是他隐居田舍后的生活,陶渊明都不具备休闲的要件,没有实现休闲伦理三个维度的有效统一。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陶渊明不慕荣利、安贫乐道、悠然旷达。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陶渊明形象的接受经过了有意识的加工改造。接受理论认为作品文本的接受是一种阐释活动。作品的意义是读者从文本中发掘出来的。陶渊明的诗文,通过不同朝代读者接受的删减、增加,甚至推翻,致使真实的陶渊明形象日益模糊。

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和他的人生之路不同步。在世时,主要以“隐士”的形象示人。去世后,沈约将他归入《宋书·隐逸传》,钟嵘《诗品》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到唐代由于时代发展的需要,陶渊明被建构成“旷达知足、怡情于酒、遗世独立、悠然自得”的形象,白居易进一步突出了陶渊明不慕荣利的形象。到两宋时,在邵雍等理学家、苏轼等人的推介下,陶渊明成为安贫乐道、飘逸超脱的形象。此后,陶渊明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变化不大。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苏轼等人大力推许陶渊明,主要源于他们政治上的失意,他们看重的是陶渊明闲适的生活情趣、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和超越功名的人生态度,寄望于陶渊明这个偶像超越现实,求得精神的安慰。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

恶化,人们休闲观念的增强,陶渊明又被有针对性地加以“改造”。对此,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了警示,指出陶渊明不总是飘飘然,有时也金刚怒目,“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15]。笔者之所以仔细梳理陶渊明诗文,认为他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休闲,并不是以此否定陶渊明的伟大之处,而是觉得真实的陶渊明形象更加可亲,更加可爱,也更加迷人。

参考文献

- [1] 鲁枢元. 素心清谣:清贫自守与消费社会[J]. 中州大学学报,2012(3):9-11.
- [2] 潘立勇,陆庆祥. 中国传统休闲审美哲学的现代解读[J]. 社会科学辑刊,2011(4):172.
- [3] 马惠娣. 休闲问题的理论探究[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74.
- [4] 马惠娣. 人类文化思想史中的休闲[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61.
- [5] 潘立勇. 休闲与审美: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5.
- [6] 陈冬根. 陶渊明彭泽辞官别解[J]. 江西社会科学,2010(2).
- [7] 曹胜高. 陶渊明与东晋玄学之新变[J]. 中国文学研究,2012(1):51.
- [8] 朱光潜. 诗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 [9] 钱志熙. 寒素诗人陶渊明[EB/OL]. (2009-10-22) [2013-10-10]. http://www.gmw.cn/01gmb/2009-10/22/content_997096.htm.
- [10] 刘浩. 陶渊明思想研究述评[J].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1(2):343.
- [11] 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13.
- [12] 袁行霈.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与陶诗的自然美[M]//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48.
- [13] 张治国. 陶渊明的精神生态景观[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146.
- [14] 邵明珍. 重读陶渊明[J]. 文艺理论研究,2010(3):103.
- [15]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而已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97.

(责任编辑 陈咏梅)